



卓越学术文库

晚清时期卢梭 在中国的政治形象问题研究

WANQING SHIJI LUSUO ZAI ZHONGGUO DE ZHENGZHI XINGXIANG WENTI YANJIU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余金刚 著

非外借



郑州大学出版社



卓越学术文库 ■

晚清时期卢梭 在中国的政治形象问题研究

WANQING SHIQI LUSUO ZAI ZHONG GUO DE ZHENGZHI XINGXIANG WENTI YANJIU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余金刚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 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时期卢梭在中国的政治形象问题研究/余金刚著.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8. 8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5268-8

I. ①晚… II. ①余… III. ①卢梭(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
1778)-影响-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B565.26②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9773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 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豫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710 mm × 1 010 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84 千字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电话: 0371-66966070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5-5268-8 定价: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目录

导言	1
一、问题的缘起	6
二、研究现状梳理	16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26
第一章 本原卢梭的考察：晚清时期卢梭中国形象的学理原因 分析	30
第一节 卢梭化身为儒者的可能——卢梭政治哲学与儒学内在 逻辑理路的一致	30
一、人的概念化	31
二、“政治领域的宗教人伦化”	39
第二节 卢梭作为民权主义者的可能——政治正当性的道德 诉求：人民主权	44
第三节 卢梭作为革命导师的可能——神义论语境下卢梭社会 契约论所蕴含的激进性分析	49
一、古希腊目的论宇宙论下的神义论问题	50
二、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兴起的神学背景：中世纪邓·司各特 的唯意志论	53
三、卢梭：人为构建的宇宙论	57
小结	66
第二章 西洋的儒者：卢梭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交相 呼应	71
第一节 中江兆民“看”卢梭：“倡教化抑艺术”的德治主义者	72

一、儒学式的人民主权理论	73
二、儒学式的“心思自由”论	77
第二节 儒者形象卢梭传播与形成的环境脉络分析	81
第三节 刘师培:纳入儒学传统的《民约论》	90
一、民约的性质	91
二、“公”“公德”与“公意”	95
小结	103
第三章 民权主义者形象的卢梭及其中国意义	106
第一节 晚清民权概念的中国语义:民权主义者卢梭的话语背景	106
一、中文“民权”一词的由来	107
二、君民共主——改良主义民权话语之隐喻	109
三、革命主义的民权话语:民权即国民权	121
四、民权之主体:“国民”术语的内在张力与国家联想	123
第二节 民权主义者卢梭对于改良派的意义	132
一、抨击反民权言论的工具	132
二、梁启超眼中的“医国国手”	135
三、严复的批判对象	151
第三节 民权主义者卢梭对于革命派的意义:由“人民主权”到“主权在民”	154
一、民——不知不觉的“阿斗”	155
二、自由——秩序与团体凝聚力的丧失	157
三、平等——真与假的区分	159
小结	160
第四章 晚清革命话语的激化:民权主义者卢梭升华为革命的象征符号	162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政治激进主义的形成与“革命”含义的转变	162
第二节 中国传统革命话语的近代转化	166
一、儒家传统革命观念	167
二、中西革命观念的相互格义	172
三、革命:“天演之公例”	176
第三节 “革命”话语的胜利:卢梭化身为革命精神的象征	181
一、论战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是与非	183
二、论战之二: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之相关问题	189

三、卢梭作为革命符号的象征意义	193
小结	199
第五章 晚清时期卢梭的中国意义	201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中国知识者为什么推崇卢梭	201
第二节 两种不同价值层次的卢梭	205
第三节 晚清时期卢梭中国形象的实用主义性质	208
小结	210
结语	212
参考文献	218
后记	228

导言

卢梭作为最有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其政治形象是复杂和多元的,在西方学界,卢梭政治形象的多元化主要与卢梭著作本身的多面性、复杂性以及西方学者对卢梭政治思想的解读进路有关。正如巴克所言,“你是左派也好(特别是左派中的左派),是右派也罢(特别是右派中的右派),在卢梭那里都能找到你自己的信条”^①。围绕着卢梭政治哲学的性质问题而进行的争论一直是一个热点,“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围绕着卢梭是‘自由主义者—威权主义者’或‘强力—自由(force-freedom)’这个背反问题的讨论,作为集中的争议点,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②,例如德·迈斯特和博纳尔谴责卢梭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和倡导毁灭性混乱的哲学家,后来诸如亨利·梅因爵士之类的批评家抨击卢梭立了一个“集体的暴君”,并在《社会契约论》中再次引荐了“身着新衣的老一套君权神授说”^③;贡斯当认为,卢梭政治理论的致命弱点是将自由原则与人民主权原则联系在一起,要求社会的每一个体将自己的权利毫无保留地完全转让给共同体,他的《社会契约论》为各种暴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的错误使得他的《社会契约论》,如此经常地被援引为同情自由,但实际上是各种暴政的最可怕的支持”^④;与贡斯当类

① [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导言,[美]彼得·盖伊编,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② Guy H. Dodge, Introduction to *Jean-Jacques Rousseau: Authoritarian - Libertarian?* D. C. Heath and Company Press, 1971.

③ [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导言,[美]彼得·盖伊编,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④ Benjamin Constant, *Supporter of Despotism*, from *Jean - Jacques Rousseau: Authoritarian - Libertarian*.



似,泰纳也认为,卢梭想用他的政治学说来给法律和政府以致命一击,结果却反倒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暴政,“被普通大众解释的人民主权教条,即将酝酿出彻头彻尾的大混乱,一直闹到由首领们来解释之时——此刻这一教条又将产生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①;与此相反,托马斯·希尔·格林却认为卢梭是哲学理想主义的先驱,他的理论很好地阐明了政治义务的原则^②;希波来提·泰恩也认为卢梭为“民主同意”原则奠定了基础,他的政治理论是反映了该原则精神的学说。^③

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学者争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卢梭是个人主义还是极权主义的支持者。支持卢梭是个人主义者的学者有查普曼、亨利·塞,“我们面前的卢梭……是一名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说他想要给予国家绝对的、富有侵犯性的权威是不合事情的”;卡尔·波普则将卢梭的政治取向说成是“浪漫的集体主义”;欧内斯特·巴克也指出,“卢梭事实上是一个极权主义者……就算将卢梭设想为完全是个民主主义者,他完美的民主依然是一种多元的独裁”^④;认为卢梭是极权主义者的最具代表性的人是塔尔蒙,他指出“卢梭认为被客体化了的公众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公意,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公意本质上代表了自然调和的某种法则。为了使得这一法则与人民主权的原则以及人民自我表达的原则相结合,卢梭提出了一种极权主义民主主义的民主主义”^⑤;而著名卢梭研究专家、卢梭通信全集的编辑者、剑桥大学教授里奇表却指出,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同时,卢梭还在写作《爱弥尔》。如果一方面认为《爱弥尔》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又认为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意”是极权主义式的,那真是思想史上的一大奇案了^⑥。而C. E. 伏汉则将卢梭的思想解

① [法]伊波利特·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黄艳红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第250页。

② Thomaas Hill Green, *Precursor of philosophy Idealism*, from *Jean-Jacques Rousseau: Authoritarian - Libertarian*, 转引自袁贺:《试论卢梭政治形象的争议及研究新路向》,《历史教学》,2004年第10期。

③ Hippolyte Taine, *Builder of the "Democratic Convent"*, from *Jean-Jacques Rousseau: Authoritarian - Libertarian*.

④ [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导言,[美]彼得·盖伊编,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⑤ [以]J. F. 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⑥ R. A. Leigh, *Liberty and Authority in On Social Contract*, in Alan Ritter, ed. *Rousseau's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lated by Julia Conaway Bondanella, New York: W · W · Norton & Company Press, 1988, pp. 232-233.



释为一段从个人主义成长为集体主义的历程,“把卢梭的政治著作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它便呈现出从一个立场转向几乎是其对立面的一种不间断的变动。……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抽象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论》抽象的整体主义都同样被忘却了……这一漫长的历程终于结束。卢梭现在正站在其出发点的对立处”^①。德国新康德主义大师卡西勒则认为,卢梭是从属于启蒙阵营,但是他是分裂的形式属于启蒙阵营,整个18世纪只有一个外国读者——康德——读懂了他的原意,他的观点拓宽了认识卢梭思想基本属性的视野。^②

除此之外,随着共和主义的复兴,卢梭还被西方学者看作共和主义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我们这里所论证的思路与让·雅克·卢梭的共和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卢梭看来,自由的主要因素就在于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就像他往往指出的,在于非依附(no-dependency)……卢梭的解决办法是,要求法律接受他所设想的民主约束:在充分参与的条件下,它应该是公共意志的一种体现”^③;哈贝马斯也将卢梭称为“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奠基人”,哈贝马斯这样评价法国大革命:“解放了的个人共同被召唤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命运。决定他们共同生活之规则和方式的力量,就在他们手上。他们将服从的法律,就是他们作为公民自己制定的:就此而言,他们共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根据他们的理解,这种条件是一种合作实践的产物,这种实践的中心就处于自觉的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之中。一种彻底入世的政治把自己理解为是对自由的表达和确认,这种自由同时产生于个人的主体性和人民的主权性”^④;同时,尤文纳尔(Jouvenel)、德国学者费切尔则将卢梭视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在《论卢梭的政治哲学:关于民主自由概念的历史》一书中,费切尔指出卢梭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同路人”,也不是“专制主义的反对者”,而是一位彻底的“保守主义者”,将卢梭视为“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的奠基人”,纯属

① [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导言,[美]彼得·盖伊编,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

③ 卢梭被视为共和主义者主要与共和主义将自由定义为无支配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美]阿兰·博耶《公民共和主义》,应奇、刘训练编,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和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330页。

④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26页。



一厢情愿的臆断^①。正是基于卢梭著作自身的复杂性,20 世纪西方研究者才主动或被迫摸向卢梭文本的背后,试图寻找能够阐释卢梭思想的其他进路,进而使得卢梭研究的方法论得到了更新。在这个问题上,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响应。^②

相对西方卢梭政治形象的多元化而言,卢梭的文本传入中国后,其政治形象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总体而言,卢梭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辛亥革命前后,那时中国知识者主要将卢梭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联在一起,学理探讨并非主流,其依据的文本可能主要是卢梭的半部《民约论》。第二阶段主要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对卢梭的学理探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研究又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关于卢梭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问题;二是关于卢梭政治思想本身的探讨与解读,主要涉及“社会契约与自由”“主权者”“立法者”“公意”“公民与公民宗教”等方面^③。笔者认为,卢梭在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形象的多元化与卢梭著作自身的性质与特点有关,卢梭的语言风格给后世研究造成了巨大障碍,正如休谟所说:“他的著作里确实满是夸诞之辞,我无法相信单凭滔滔雄辩就能支撑起他的著作。”^④卢梭使用的核心概念虽然都是借用当时流行的词汇,但其用法却大相径庭。同样的词汇,谈论的却是不同的问题,“他对概念的歪曲使用,在读者那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读者会不知不觉地被这些词语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⑤。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恒定的传统构成了中国知识者认识 and 了解西方文明以及西方政治思想、观念的思维框架。虽然从 19 世纪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原本支配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已经开始松动,但是当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 19 世纪下半叶以降,当传统中国被迫进入全球背景的“万国”以后,传统世界观念受到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而当人们意识到简单地

① 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可参见曹卫东《卢梭是个保守主义者》,《读书》,2002 年第 1 期,第 89-97 页。

② 袁贺:《试论卢梭政治形象的争议及研究新路向》,《历史教学》2004 年第 10 期,第 32-36 页。

③ 袁贺,谈火生:《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版(该书的导论部分以“卢梭的中国面孔——中国卢梭研究百年述评”为题发表于《政治思想史》,2010 年第 1 期)。

④ [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导言,[美]彼得·盖伊编,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 页。

⑤ [英]以塞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 页。



模仿西方文明之技术不能自强的时候,传统就逐渐成为众矢之的,相当多的人开始越追越深,觉得传统文明需要从根本上重建,“这种想法在一种四面楚歌式的紧张心情中越来越强烈,究竟什么才是根本?很多人觉得,是传统的知识体系需要更新”^①,其直接带来的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后果之一,就是传统知识系统的最后崩溃和瓦解;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死人的支配权”,传统却继续发挥着作用,“死者成了活人的依恋对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和包含在他们的惯例之中的规范,影响着他们毫不相识的后代的行为”^②。也就是说,传统的本土文化成为我们看待西方文明的有色眼镜,因此,“由于中西两大文明的个性特征差距较大,相互认识对方也有着更大的困难。从这个角度上说,在中西文化接触的过程中,特别是其早期阶段,我们误读西方是正常的,不误读反倒是不正常的”^③。

第二,当时中国知识者的问题意识。“思想”没有翅膀,以传统中国士人的文化自信而言,如果不是现实政治社会面临严重问题,根本不可能为新思想资源的引入创造有利的土壤^④。根据张灏的观点,1895—192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转型时代^⑤,此一时期,近代国人接触和学习西学的态度主要是国家富强,因此在这种态度下,任何一位西方思想家之所以能进入国人的视野并成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因为近代国人主观认定他们的学说能够解决当时中国日益严峻的国家和社会危机,特别是伴随着所谓的“现代性的入侵”,“富强”在“理性”的名义掩护下,以“实用”和“有效”的方式,被当作“文明”的标准,一个一元的、普世的价值标准。“富强”的口号和一切有关的联想,赢得了统治阶级中大多数明智人士的默认,并且使讨论转向了新的话题,即什么是达到富强的先决条件?由此而引发的问题是除了直接与军事考虑相关的机械工业和商业,他们考虑的是导致西方国家富强的社会政治组织、制度、思想和价值观念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否与儒学的核心内容相一致?^⑥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焦虑和紧张的心情始终笼罩和控制着中国知识人的思想,他们觉得不超过西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页。

② [美]E.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③ 丛日云:《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误读》,《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7期,第56—62页。

④ 王汎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

⑤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⑥ [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洋人,不战胜东洋人,就不能证明中国文明存在的意义,也不能证明中国民族存在的价值。正是因为当时人已经开始把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中,而全球万国之间又以强弱论英雄,而强弱又以富与强划分,是非则以成王败寇来定,所以‘富强’就等于‘文明’,这种关于‘文明’的思路引起一系列的观念转变”^①。在寻求富强的目标下,卢梭在近代中国的命运类似于密尔,就像史华慈曾经指出的:“严复的《群己权界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最明显的通过翻译阐明他自己观点的例子。……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②鉴于此,笔者认为,晚清时期的中国知识者主要关注的不是作为思想家的卢梭而是作为实现国家富强工具的卢梭,这两种形象的卢梭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如果关注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卢梭,那么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卢梭思想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卢梭是如何阐述和回答这些问题的,对于卢梭学说的阐述和理解也应该主要从卢梭本身出发;将卢梭视为救国之工具,关注的则是卢梭学说中哪些因素能够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至于卢梭本人是如何阐述其观点的,则不是关注的核心。正是在这一工具主义卢梭的观照下,卢梭在晚清时期的中国至少呈现出了以下三种不同的政治形象:儒者、民权主义者、革命之象征符号。当然,清末中国知识者对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和观念产生误读是正常的,因为他们都是“戴着纯正的中华文明的有色眼镜去观察和解读西方文明,必然会出现这种误读”^③。

一、问题的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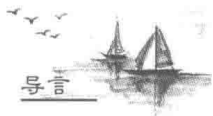
“中国如何接受卢梭,是一个巨大的几乎未开发的领域”^④,研究晚清时期卢梭在中国的政治形象问题的意义在于:首先,晚清时期卢梭在中国知识界的政治形象问题是“近代国人如何接受卢梭”这一理论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考量这一理论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相对于其他研究视角而言,这样一种视角使我们能够对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卢梭的特点等问题有一种宏观上的理解和把握。以往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以个案研究为主而且往往集中于探讨近代国人是如何解释卢梭《社会契约论》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8页。

② [美]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③ 丛日云:《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误读》,《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7期,第56-62页。

④ [法]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5页。



的,而对卢梭在中国的政治形象问题关注得不够。笔者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解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只构成了近代中国如何接受卢梭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当然,在西方,这两个问题——如何诠释卢梭著作和卢梭的政治形象——是相关的,即对卢梭著作的诠释决定了卢梭的政治形象,西方学者对卢梭著作的解读不同,卢梭的政治形象也就不同;而就晚清时期的中国来说,在国人还远远没有注意到卢梭著作复杂性的情况下,卢梭的政治形象同样是多元的。

鉴于此,笔者认为研究近代中国如何接受卢梭,不仅要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解读《社会契约论》的,还要研究卢梭的政治形象问题,由于近代中国的中心议题是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这就决定了近代国人对待卢梭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进而决定了他们接受卢梭的方式,即他们关注的不是卢梭著作的整体性和学理性,而是卢梭著作中哪些观念能够解决当时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问题,正是这样一种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导致了卢梭在中国晚清知识界政治形象的多元化,同时,卢梭的政治形象问题亦反映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卢梭的特点:迅速解决中国国家和社会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始终支配着他们对卢梭及其著作的理解,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卢梭的著作不可能进行一种整体性和深入性的认识和研究,在关于卢梭的问题上亦不可能形成一种“为求知而求知”的态度,相反只能是从卢梭的著作中截取一些认为对自己有用的价值观念并将其不断绝对化。

其次,近代以降,在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想家中,卢梭有其独特的地位。他不仅较早就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而且还对中国近代实际政治运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吴雅凌的考证,从19世纪80年代起,某些著作里已经出现卢梭的名字及其简介^①;另一方面,自从卢梭这个名字传入中国,中国关于卢梭的研究就不绝如缕,产生了大量文献,不仅如此,在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中甚至一度专门设立过“卢梭政治哲学”的课程^②。晚清时期中国思想界对卢梭的持续关注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从思想资源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已经进入“世界在中国”的情形,西方及日本的思想知识资源大量涌入中国,逐步填充躯壳,或是处处与传统的思想资源相争持,最后取代传统思想的地位,正如王汎森所说:“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

① 吴雅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汉译及其影响》,《现代哲学》,2009年第3期。

② 袁贺,谈火生:《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导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页。



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但无论如何,人们是透过它们在想事情。”^①因此,希望通过笔者的研究,能够为这一现象提供一种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下列问题:近代国人为什么青睐卢梭、他们更推崇什么形象的卢梭?卢梭在近代国人接受西方政治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往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卢梭的著作(主要是《社会契约论》)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上。笔者认为,这样一种研究不能说不正确却失之笼统,因为近代中国人所接受或理解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都带有中国人的特点,即西方的思想观念在近代中国人的视野中从一开始就带有中国文化特色,他们接受的是被他们所曲解的西方思想观念,卢梭也不例外。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推崇和欢迎的卢梭也只能是他们所接受的卢梭。因此,研究晚清时期卢梭在中国知识界的政治形象问题,就是要考察中国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打扮卢梭的,其语境和目的是什么,不同政治形象的卢梭其生成过程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的政治心理和价值取向,考察的重点不仅局限于晚清时期中国思想家在宣传卢梭思想时的观点以及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一旦涉及当时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问题时,他们对卢梭的思想做出了怎样的修正。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卢梭政治形象的形成或者说建构过程反映了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即概念或思想在东西方之间进行跨文化诠释和语言文字的跨文化交往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对于这一问题,已形成各种富有启发的理论。例如普遍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在形成有关其他民族的观点时,或者是为其他文化同时也是为自身文化整体的同一性设置各种话语的哲学基础时,他们所依赖的是这样一种来自双语词典的概念模式——A语言中的一个词一定对等于B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词组,否则的话就是有缺陷的^②;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却认为所谓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对等词只不过是语言的隐喻功能或者幻觉,这种隐喻功能或者幻觉帮助在互不相关的词语之间建立起同一性,从本质上说,这种对等关系是不存在的^③;以赛义德为代表的旅行理

① 王汎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

②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页。

③ 郭忠华:《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 citizen、citizenship 汉译为中心的论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论则强调词语、范畴创造性地借用、挪用以及在国际环境中从此处向彼处的运动,对此,赛义德提出了“四个阶段”的著名论说:“首先,存在着出发点,或者似乎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其次,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一个通过各种语境之压力的通道,而思想从较早一个点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再次,存在着一组条件——称之为接受的条件好了,或者是抵抗(接受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条件——而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也使得对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引进和默认为可能,无论它们显得多么疏远。最后,现在已经完全(或者部分)被接纳(或吸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①,然而,在赛义德这里,旅行成为一种抽象的思想,以至于理论在哪个方向旅行(从西方向东方还是相反),出于什么目的(是文化交流、帝国主义,还是殖民化)旅行,或者使用哪一种语言、为哪些受众旅行,这些问题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研究则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问题进行反思,认为文本可以为了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被加以运用。

笔者在这里尝试将卢梭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问题置于跨语际实践理论视域下来加以思考,因为,“词语的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而语言之间的‘互译性’也必须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去理解和研究。任何互译都是有具体的历史环境的,都必然被一定的具体条件和话语实践所规定”^②。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主要得益于柯文所提出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范式“中国中心观”,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集中考察并反思了三种主要的思想范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其中,“冲击—回应”模式主要通过中国对西方的冲击的回应来解释中国现实。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上,因此很容易“鼓励人们把并不仅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做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做出的反应。此外,它还促使史家认为凡是和西方入侵没有明显联系的中国近代史的各个方面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只有当这些方面有助于说明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时才是重要的”;“传统—近代”模式基本上是“冲击—回应”模式的放大,侧重于从西方近代史角度就中国历史提出问题,它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近代”西方赋予生命,其错误在于“把一种来自外界的、狭隘的西方观点,即关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界

①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页。

② 王人博:《庶民的胜利——中国民主话语考论》,《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说,强加在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模式像前两种取向一样,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必要的历史先决条件,无法独立产生工业革命,因此得直接或间接地靠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这样一种取向实际上陷入了“非历史的困境”,它假设中国历史本来有一种“自然”或“正常”的发展道路,可是这种道路受到西方(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①。作为对上述范式的修正,柯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取向——“中国中心观”,其益处在于它是从中国语境中存在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这些问题可能受西方的影响,甚至是由西方造成的;有的则和西方毫无联系。但是不管怎样,它们都是中国的问题: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②。这种新的取向对于笔者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再去关注传统的所谓影响研究,转而强调主方语言在诠释卢梭的过程中产生意义的能动作用,而客方语言要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意义,也就用不着总去强调原文本意的权威性了。关于文化翻译的观念,埃德蒙·里奇指出:“语言学家早已告诉我们,所有的翻译都是困难重重的,而完美的翻译通常是天方夜谭。然而我们也知道,出于实践的目的,某种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不管‘原文’多么佶屈聱牙,毕竟不是绝对不可翻译的。语言是各不相同的,但还不至于不同到完全无法沟通的地步。”^③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而是译者的实践目的或需要。

跨语际实践理论认为:第一,考察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交流与翻译,以及词语和思想的旅行,是避免非历史、非话语研究方式和文化相对主义的主要途径。第二,跨语际实践的关键并不是去研究翻译的历史,也不是去探讨翻译的技术层面,而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的模式,不同语言之间的最初语际接触会致使概念本身发生变化: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再是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冲突着的利益无关的中立的事件。实际上,它恰恰成为这种斗争的场所。第三,本源语的思想往往依赖于本真性、本原、影响等概念,如果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互动总是由主方语言的翻译者或者其他实践者从客方语言中邀请、选择、组合乃至重新发明各种词语和文本而开始

①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5-56页。

② 同上,第170页。

③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页。



的,而且除此之外,如果主方语言的翻译者与他的接受者的共同需要决定着并且开始协商着从客方语言中抽取的文本的意义,那么传统的翻译理论家用以命名与翻译直接相关的语言时所采用的术语不仅不合适而且还会产生误导作用。第四,强调历史观念的扩展,即把语言、话语、文本视为真正的历史事件,其中尤为重要是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新词语和新词语的建构是有关变化的一个极好的喻说,因为创造新词语旨在同时表述和取代外国的词汇,而且由此确立自己在语言张力场中兼具中外于一身的身份。我们并不是在对等词之间进行翻译,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翻译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着对等关系的喻说。”^①基于这样一种理论,我们可以将近代中国对卢梭的翻译和接受视为一个创造性发明的过程,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权力、政治和思想含义,据此,我们可以窥见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想象。

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讲,“翻译的现代性”以下列假设为基础:第一,出于某种实际目的,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是可能的。第二,翻译的关键在于揭示某些重要而共同的东西,忽略某些对主方语言来说不同、不适或者相对不重要的东西,同时添加某些对主方语言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以此达到使术语服务于实际目的的需要。“人类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本质上是一个表面现象。翻译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遗传方面、历史方面以及社会方面这些根深蒂固的普遍特征是存在的,所有从这个基本结构派生的语法都能够被有效地放置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之中并被人们所理解,而无论其表面的形式何等独特或者怪异。从事翻译就是要穿透两种语言表面的分歧,把它们之间相似的东西,归根结底是共同的存在根源揭示并发挥出来。”^②第三,新术语的引入为过去与未来架起了桥梁,为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和对政治进行新的想象提供了可能。如果把现代性看作扭转历史发展的传统路径而创造新的历史发展方向的话,或者说“运用历史来创造历史”,那么,这种同时承载了主客方语言某些含义的新术语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工具。^③

“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象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④,一个民族的文字符号系统反映的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政治符号也是如此。

①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5页。

② 同上,第17—18页。

③ 郭忠华:《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 citizen、citizenship 汉译为中心的论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④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修订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页。